

文革博物馆专集（二十五）

治思想史者，多半有翻案癖，希望在自己的笔下为某一个思想人物洗出一段清白，或是为某一类思想事件洗出一段光彩。我自进入思想史这一行当，始终有一个古怪的寻踪癖，想寻找一群还活着的人，二十年前他们有过一段思想踪迹，似可载入大陆思想史。我曾希望这群人能站着进入思想史，或许能改变一下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横躺着的先逝者的沉闷格局。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感觉自己之所以进入思想史，而不是历史学的其它门类，就是为了寻踪他们而来。

一九六八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高中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些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

那时我才小学毕业，只能守候在弄堂口等候两个在重点中学的大龄伙伴黄昏回家，给我讲述当天在他们校园内发生的思潮辩论，或者是那些有思想色彩无具体派性的大字报。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后来我那种对思辨生活的偏好。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点，我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一个人选择了没有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九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的生活氛围。一九七二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气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候，用我后来的体悟，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之后，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今天想来，当时是以旺盛的体力、贫弱的学力沉浸于那些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的争论，而且还属于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既觉得可笑，也留有一分怀念。我开始熟悉黑格尔、别林斯基的名字，不是在大学讲堂，竟是在那种时候，肯定有浅陋误读之处。然而事后回忆虽然有点可笑，当时那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却有一个今日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你不可能指望那样的讨论结果能换算为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这样的思想炼狱中获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职称。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就算不错了。

从“民间思想村落”出来后，我始终摆脱不了当时那些业余状态下的精神记忆。这些记忆成为某种剩余意识，难以被学院生活完全吸收。学院生活对我而言，就好象进入一道四则运算，思想意识大多被整合归位，但是最后还剩下一些因素，通过最后一道除法，怎么也除不尽，成了一些除不尽的“余数”。这些小数点后的余数，时时作祟，既是烦恼，却也造成一些别样的情怀。我相信，当年那种业余状态下的思想生活里有必须淘洗的东西，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不必抛弃。知识与思想的传统是必须尊重的，轻易否定自己的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前人，哪怕是半截子前人，都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我所经历的一九六八年人“民间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转眼即逝，也不该美化。但是有一教育史的发展趋势却可注意，也不限于哪一年代哪一国度；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的传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批量化复制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规模复制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往往是大学体制集中释放它体制性毒素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稍有性情者，无论是在哪所院校，都会感到是生活在“三间大学”，“一地鸡毛”。每年的这种时候，我会更加怀念当年散播在乡野小城的那些“民间思想村落”。身陷大学环境，理应充分尊重知识传承，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另一份同样充分的对知识体制化毒素的警惕与抵制，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很难均衡健康地发展。

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后我在学术领域生活十年，自己也没有寻找到当

年那些不计功名纯对思想发生兴趣的同道。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似乎集体失踪，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再也找不到了。一九九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集一批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老三届写稿，出版《苦难与风流》一书。我把自己那篇回忆老三届的文章写成了一篇“寻人启示”——

我始终在寻找他们，该不会烟飞灰灭？我读《枫》，枫说他们已去；我读《伤痕》，伤痕里没有他们的印迹；我读《蹉跎岁月》，那里面只有飘浮的枝叶。我还是贴一张寻人启示吧，或许他们中会有人路过，能够辨认出自己昔日的足迹？

——你们大多毕业于重点中学，那时重点中学的熏染，胜过今天的研究生毕业。从此你们关心精神事件，胜过关心生活事件。即使在一九六八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那一年你们卷入思潮辩论，辩论延续至农场，延续至集体户。你们是自愿离城，不是被迫离城，因此不会说这是“伤痕”，那是“蹉跎岁月”。后来你们被打散，后来你们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年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类书！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一九七五年以前，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阅《天安门诗抄》。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你们大多选择了文科院校——

后来呢，被专业吸干了？被功名掏空了？还是被某一档职称腌制在某一层书橱里？

早在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以前，你们已经在思考通常是知识分子在思考的问题。即使在获得这一身份之后，你们选择的课题也应与早年的问题相距不远。你们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这是你们的命运，注定你们不可能雷同上下两代人。前十年你们有问题，却苦无学理；后十年你们学会摆弄学理，却可能遗忘问题，更遗忘勇气。你们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学院里的学理，不应是用来换取学位的，那是同辈牺牲近百人才换来你一个人的思考机会与发言权力。

“寻人启示”寄托了我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寻找那些游弋于体制内外尚未除尽的“余数”，却苦寻不遇的心结。他们理应还活着，之所以隐匿不见，是不是也因为功名利禄的腐蚀才失踪了呢？“民间思想村落”移植进大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与正规的研究条件，这是天大的幸运。但是，一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就直奔学术身份的前程，在接受知识传承的同时，精神灵魂被知识的体制化毒素吞噬，被高高低低的职称“腌制”在高高低低的书橱里——如果真是这样，灵魂被“除”尽，一点“余数”都未留下，我敢说，那就是一代人买椟还珠的悲剧。

没有一个人来揭下这份“寻人启示”。不过，我内心对“六八年人”的感谢与期待还是没有熄灭。我既对他们失望，又对他们怀有旧情，甚至有一种欠债感。如果说我进入学术生活以后，在近代思想史专业领域内还能作点工作，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当年那些游荡在学院大墙外的孤魂野鬼。在我给大学生记述书本上的思想史之前，是那些“六八年人”——业余思想家，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罗列的讲义，给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此，他们使我能从血肉中感觉得到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史，什么是三流教授为换取职称而编制的印刷垃圾。

欠债感一直延伸到一九九三年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我打破那类出版物序言的写作惯例，写完向导师致谢的一节后，又另辟一节交代论文的最早“灵感”来源，是在进入学院生活以前那段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的思想经历——十几年前“六八年人”对我的那场思想启蒙：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一九六八年为界。那一年正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辩论的年代。……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一本法国人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无论他们走到那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尽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一九六八年产生的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着他们的思想命运。就我而言，一九六八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中国的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历史实在残酷。“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数后来是牺牲了，或者说是被消耗了，只留下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进入学术环境，以学理言路继续思考六八年问题。也许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然而也可能因为这一点，我的思考显得格外拖累：既要延续六八年的思考，又要避免对法国革命的穿凿附会；既要尽可能客观清理从启蒙到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思潮源流，又要为我下一步研究把重心移到中国留下足够的发展脉络；既要坚持法国大革命中高昂的价值理性，又要批判这一价值理性越位逾格所造成的负面灾祸。这三层拖累，尤其是最后一层拖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六八年人”来说，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心理代价。在本书写作最痛苦、最动感情、又最需要克制感情的日子里，我给友人写信说：“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

……

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历史无情，埋没多少先我而知者？天网有疏，间漏一二如我后知者。先知觉后知，是谓启蒙；后知续先知，勉为继承。谨以我绵薄之作，敬献顾准先生在天之灵；同时，亦以此敬献我同时代人中的启蒙者、牺牲者，也算是一份迟到多年的报答。

我的论文答辩主持人在看到这一序言后，约我面谈了一次。那次谈话开始时，我还有点忐忑不安。不料老人开口竟说，我关于六八年人的记述打动了他，使他知道当初在牛棚里尚无法知道的情况。听完老人的那一席话，我极感意外，同时也自觉惭愧。我们自己敝帚不珍，就在上一代人好不容易开始理解我们当年的思想经历时，“六八年人”自己却正在走向消失。珍惜这一经历的当事人一个一个少下去，理解这一经历的老一辈学者却可能一个一个多起来。这不也是思想史，而且是以现在进行时态在当下发生着的活生生的思想史？

就在我几乎对自己这一代人失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故事。一九九四年春节，上海发起邀请全国灯谜大赛，电视台录象向全市转播。荧屏一闪，突然出现了一个我打听了十二年也不知下落的朋友的面容。我赶紧去比赛地点找人，一问，却是刚走一天。几天后，我把这场寻友不遇的感受，写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版上：

自从离开了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还值得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昏暗的铁路铁轨边。他有过那样辉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唯一的职业谜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我自以为我所有的写作就是为了我的同代人，但是我的同代人大都离我而去。我只能放弃希望，放弃寻找。

少数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另一些浮上来的学术明星，并无多少思想可言；这些年越炒越热的“知青热”、“老三届热”，未必能揭示当年另一批人的精神追求；而确实参加过“六八年思潮”的人，也参与了这种实际上是在篡改他们精神轨迹的庸俗合唱；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鸡毛”的伴奏下，满脸油汗地高唱着自己的“劫后辉煌”，却把当年真正珍贵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脑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去记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面对这幅图画，我只能背过脸去。

我曾想挣扎，最后为自己这一代辩护一次。但是，底气越来越弱，声音越来越轻，终于被内心另一种声音压了下去：

思想史上以一九六八年命名的那一页精彩记录，逐渐受潮瘫软，发黄变质。时至今日，它已经像一张废弃的陈旧日历，飘进了城市这个硕大无比的废纸篓。大多数人进入了灰色的小官吏、小职员状态，正在抱怨生活的不公，要求生活给予补偿。由于具备底层的生活经验，洞悉明察社会结构及其组织细胞的各种缝隙，内心深处又解除了当年那种虚假道德束缚，“六八年人”将游刃有余地穿插于各种结构的缝隙，从中渔利。新一代社会中坚也许就会这样形成。

新一代社会中坚是灰色的，这是因为“六八年人”的内心世界有过一场灰质化裂变。那场裂变不知道是哪一天发生，但是却可以看见那股世故而又狡猾的灰色一天天从里向外泛出来。当年的思辨能力很少转化为思想史上的精神资源，而是转化为在社会层面上夺取权力资源与生活资源的世俗经验。我们的内心已经结痂成茧，外伤变为内伤，很不透明，甚至难以射进阳光。如果说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历史大限，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大限，就停留在这里。

“六八年人”的精神生命已经死亡。

赋予我们精神生命的那块思想文化土壤，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给予最善意的估价，只有十七年的积累，太疲乏，太浅薄。尽管我们当时读了一点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能起作用的毕竟有限。更何况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与十七年政治文化在某一方面是同属一脉，后者是前者的遥远后裔。由此，这一代人精神短命的内在原因，还在于当年我们吞下的精神面包既有营养也有毒素，我们只坚持其营养的一面，拒绝反刍其有害的一面。

对这一代精神生命的否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向下突破，回归世俗的沼泽地里打滚，这一代人中已经不少人这样做了。还有一种是向上突破，脱胎换骨，更换精神血型，走出另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到目前为止，我只在一个人的作品里看到有后一种希望，那就是张承志。他欲以笔为旗，只身面对当今虚无主义思潮的十面埋伏。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同时也担心他拒绝淘洗昔日的精神资源，恐难有效拒抗虚无主义？如果笔管里流动的是“六八年人”的旧式理想，那么下一代自然会问，这样以笔为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我敬重他的孤胆英雄气，以目相送，看他在荒芜英雄路上逐渐远去。

正在消逝的一九六八年思想群落，后来据我了解，当年在北京有过更为自觉的思考。在内地其它省会级城市，也有过零零散散的村落。于此相应，一九六八年的大陆，还出现过一些半地下的文学群落，如以食指为代表以北岛、芒克等人为主流的白洋淀村落。他们都是这一代精神生命的“根”，至少是“根”之一，比来自西方的“符号根”更有泥土气息。文学群落比思想群落幸运，从白洋淀村落到朦胧诗，从朦胧诗到崛起的诗群，再到今日之先锋作家，这条线索始终未断，而且顽强发展，结成了正果。这些年来，一部分文学史家正在紧紧追踪这一线索，一些冠以“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的出版物正在公开发行；大学课堂已经开始讲授有关这一现象的文学史篇章；不定哪一年，不定哪个文学博士会以此课题很严肃地拿到一个很滑稽的博士学位，那时食指和他的伙伴们肯定还活着，读到这一新闻，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相形之下，一九六八年民间思想界的“食指群”，则令人感慨。也许“思想食指”比“文学食指”所需要的外界环境更为宽松？也许是“思想食指”必须先指向自己，对其内部的精神淘洗要求特别苛刻？总之，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许是所有的环节都出了问题，一群“思想食指”刚刚拱出大地，一阵暴风雨袭来，很快就夭折了。他们没有结成正果，至今还处在失踪状态……

我含恨怀念我们的“食指群”。恨意难消，却还是想追赠他们一个集体知识分子的职称。不管当年他们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也不管现在是局长，还是股票炒手，那种业余状态下的精神生活，相比新科举制下现在那些功名在身吞吞吐吐的青年教授，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却又比知识分子更像知识分子。只是这一类知识分子如其它类型其它辈份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教授生命上，也是短命的一代。大多数人未老先衰，提前进入暮年状态。就外部环境之恶劣，人们应该原谅，说一声：“可惜”；就内心状态之残破，后人再厚道，至少也能说一声：“可悲”。有人说，历史的苦难总是能换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我现在越来越没有底气说这句话。更多的可能是，历史苦难积累起来的思想史资源，在起飞之前就已经堕落，进入了一种令人难堪的流产状态。

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罗曼·罗兰说，三十岁——有人才开始，有人已经死了，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故而是代有新人。然而，在代与代之间，你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一环一环向上螺旋发展。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不看今朝！

与历史学的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还是思想的暗杀者？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余数”？它既然能暗杀像顾准那样大的“余数”——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炬点燃，那就不难暗杀散播在民间村落更为幼小的零散余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句诗曾壮过多少人读史之后的胆气？然而我怕读也恨读的，就是这一熟句。是无边落木陪衬着不尽长江，还是不尽长江流淌着无边落木？两边来回读，怎么读都令人黯然神伤。还是翻过来读，才像一个暗杀者每天都在逃离作案现场，慌不择路，夜奔前程的连续记录！

不是别人，正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哥德诗云：“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这是我的烦恼。”是的，这是我的烦恼。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 雪窦寺下山后为回应“知青热”、“老三届热”而作

□ 原载《读书》1995年10月号

∞ ∞ ∞ ∞ ∞ ∞ ∞ ∞ ∞ ∞
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独立工会“全红总”
• 方 圆 •

〔续上期（zk9707e）〕

四、“全红总”第二次改组和《三家联合通告》

在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见“全红总”的会议上，江青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新朋友——李晋暄。李晋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临时雇员。李晋暄带领中央广播局五百多名临时合同工造反，成为中央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头头之一。因江青直接插手中央广播局的运动，所以颇为器重李晋暄。当天的会议上，江青直接推荐李晋暄加入“全红总”。李晋暄也表示从此中央广播局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成为“全红总”的一部分。

十二月二十七日，“全红总”召开总部会议。会上，由唐静等四十人联合提出动议，要求改组总部，成为“全红总”的第二次改组。在改组中，大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重新选举了“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按得票多少有以下五人当选：我、王振海、李晋暄、金展云、郝维奇。大家要求我担任“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被我坚拒。公开的理由是年龄太小，知识和经验不足。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没有说出来——家庭出身不好，容易成为被攻击的把柄，造成对组织的损害。在我的坚决拒绝和推荐下，王振海担任第一把手，我成为王的副手。当时改组后的“五人小组”是这样分工的：王振海掌握全盘，我则辅助之，我兼管理论、组织和主持日常工作。李晋暄专司和中央文革联络和兼管广播系统的分支组织。金展云专管国际联络（外交）。郝维奇专管对内联络和北京分团。会议决定，由首都三司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筹备组负责人史学忠和唐静、毛胜年三人组成“批判临时合同工雇佣劳动制度誓师大会”（即江青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那个“中型大会”）筹备小组。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李晋暄进入“全红总”的领导班子，应是江青插手“全红总”的开始。李晋暄本来就是江青欣赏的人，本人也是中共党员，其夫是中央广播局的处级干部，所以和中共高层有一定关系。金展云不是合同工，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对外部的波兰语组翻译。他的背景是中央广播局当时掌权的“三人小组”负责人之一的李敦白。李敦白是美国人，延安时期随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中国，早年就加入了中共，一直在中共的要害部门——广播电台负责英文广播。中共非常器重他，文革前每逢中共“十一”、“五一”观礼，他总是站在毛的旁边。文革中江青派王力接管中央广播局，成立“三人小组”，王力任组长，李敦白任副组长。以后李敦白也被中共打成“美国间谍”，关押至七八年与我几乎同时释放。现在李敦白在他的回忆录《在毛泽东身边的一千天》中也曾提到“全红总”。在英国BBC广播公司所拍那部暴露毛泽东性生活的影片中，李敦白是主持人之一，这是后话。首都三司的史学忠则是不请自来，毛遂自荐协助“全红总”筹备大会，他和江青、周恩来都有密切联系，和周的联系超过和江的联系。所以，不论他的背景是江还是周，都是中共高层企图利用、控制“全红总”的一枚棋子。至于身为中央文革联络员的邵一海，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更是公开坐镇“全红总”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了。

在大陆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八八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百五十五页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时说：“现在

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他们（王按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王按指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们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这是江青第一次煽动合同工造反。这是在谷牧十二月六日建议中央慎重处理合同工问题后讲的。会后（方按，王所指应是所谓十二月十八日的接见会），“全红总”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

王年一先生在这里把“全红总”封闭劳动部的行动完全说成了受江青“煽动”，亦即“全红总”是跟着中共高层中毛江一派的指挥棒转，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一种主观推断。因为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接见“全红总”代表前，我们作为“全红总”的主要领导人和封闭劳动部的决策者，根本不知道江青有那个王一年所指的“十二月十八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的讲话。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见时，李晋晔提到了江青十二月十八日对中央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讲话“受到有些单位负责人…不信任抱怀疑态度”时，我们才知道江青在十二月十八日还有一个关于临时合同工制度的讲话。这个讲话内容李晋晔等并未正式发表，李晋晔为此还懊悔不已。我们认识李晋晔后，经李口述方知这一讲话内容。我们在作出封闭劳动部这一决策时根本不知道江青这个讲话。如果知道，我们不一定会冒风险去先封闭劳动部，而是要按江青的指示先进驻全总了。所以说，“全红总”封闭劳动部的决策，完全是“全红总”的独立决定，并非受什么上层主导。

而《三家联合通告》的签定和印发，更是“全红总”独立独行，不受江青等中共高层利用的铁证。

《三家联合通告》即“全红总”、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在一九六七年元月二日签发的《联合通告》。主要内容是：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大约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邵一海把我和杨政叫到全总四一六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是专门给邵一海使用的。邵一海常驻“全红总”后，特别注意接近我和杨政。我想是因为我和杨政是“全红总”全国总部年龄最小的两个重要成员——也许在邵一海的心目中，我们这两个当时才十八岁的毛头小子，可塑性较强，较幼稚，不成熟，比较容易控制吧。

邵一海当时表情沉重地告诉我们：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的“三条”在常委会上（中共中央常委会）没有通过。常委中阻力很大。我听后感到颇吃惊。因为我认为当时在中共最高层，一直是毛泽东说了算。怎么会出现这种毛说了不算的情况呢？我问邵一海：刘邓不是垮了吗？彭真不是倒了吗？为什么还有人给毛主席唱反调？邵一海沉默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彭真是倒了。但刘邓不是那么容易垮的。前段时期陶铸不是暗中还在保刘邓吗？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就是刘邓陶全部都垮了，阻力仍然存在。不然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干啥？”我听后自然明白“刘邓陶”垮了以后的“阻力”应该数周恩来了。我为了弄明白邵一海话之意，故意问：“阻力是否来自国务院？”邵一海听后深深望了我一眼，猛吸香烟。政治经验老到的邵一海用默认的方法想把矛头引向周恩来。杨政则直接提出：“既然总理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炮打总理！”邵一海一听，眼睛都睁大了。他说：“炮打总理，你们有这个胆量吗？”杨政大声说：“怎么没有？人头落地，还不是碗口大一个疤？我们怕什么？”

”说着就要出去，好像马上就要行动一样。邵一海和我几乎同时出声叫住杨政。邵一海说：“你这样轻举妄动还行吗？现在的提法你要清楚：炮打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完，邵一海看话已说透，就站起身来准备走。临走前，他对我说：“小周（我当时使用的名字是“周牧”），你们要多动一下脑筋。克服阻力要想办法，蛮干是要吃大亏的。你可以和大家商量，集思广益，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配合中央文革的下一步行动。”邵一海走后，为了搞清江青的真实意图，我立即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是戚本禹接的电话。我问他江青的“三条”在常委会没有通过是否真有其事？他肯定地回答是真的。我又问他江青有何指示？他说不太清楚，他要我半小时后再打电话来，他请江青直接听电话。半小时后，我和江青直接通话。江青先是问寒问暖，问全总的走资派是不是还在为难我们。我告诉她我们按她的指示进驻全总后，一切顺利。还告诉她“全红总”第二次改组的情况。最后我问她，常委会通不过“三条”，各地仍在大量解雇和迫害临时工合同工，怎么办？她在电话中思考了几分钟，问我：“小周，你难道忘了‘我们工人阶级有力量’这首歌吗？”我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看来，她要我们继续施加压力了。

不可否认，毛江一派当时是非常想利用“全红总”直接打击对手的。而她所希望“全红总”直接打击的对手，不是刘邓陶，而是周恩来。因为当时刘邓陶均已失势，不能构成对毛江的直接威胁。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被江牵着鼻子走上炮打周恩来的道路呢？

如果“全红总”的主要负责人都是那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在当时得到奴隶主总头目毛泽东的支持和江青的重用，一定会象江青受审时所说的那样——“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指到哪里我就咬到哪里”了。是不是“全红总”缺乏胆量呢？“全红总”的领导人们从下决心造反的那一天起，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无人支持的情况下，在中共建政后史无前例的情况下，都敢于冒着杀头的风险封闭劳动部，何况是在有后台的情况下不敢去炮打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弱者的周恩来？是因为周恩来温文尔雅的装扮给人们一种虚幻的民本主义的安慰，是周恩来十七年来一副在恶婆婆前面的温驯好媳妇的形象博取了人们的普遍同情，人们都把周恩来看成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共温和路线的代表，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人们期盼周恩来有朝一日如同批判斯大林一样去批判毛泽东。所以，“全红总”的决策者们不仅没有按照江青指挥的拍子跳舞，而是独立独行地走上一条相反的道路——争取周恩来支持的道路——后来证明同样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由于我缺乏对中共党内派系和历史的深刻了解，一直把周恩来误认为是中共党内的“健康因素”，极其幼稚地想和这种“健康因素”相结合，籍以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现在反省起来，周恩来的这种好感误导了“全红总”的某些行动，甚至是“全红总”失败的原因之一。最糟糕的是，当时对周恩来的这种好感，含有相当一部分个人的感情成份。我崇敬的对象，首推国父孙中山先生。但周恩来则是我尊敬的唯一共党领袖。因为我父亲在东征时，与周恩来同在第一军。那时第一军军长是贵州人何应钦。周恩来当时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家父则是何应钦身边最亲信的参谋。所以，家父一直认为周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材。父亲对周的好感影响了我，所以我当时极力反对炮打周恩来。

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我在“全红总”总部会议上，说服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杨政，使他放弃了炮打周恩来的提议。我在会议上提出，不要把国务院树成对立面，没有必要卷入权力斗争漩涡。我们的目的是改革旧制度，而不是追求权力。为了给目前处于困境中的临时合同工解决实际问题，应该把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找来，通过正常的程序，共同签发一个有行政效力的文件，做一两件扎扎实实的事情。这比去炮打哪一个更有利于临时合同工。我的提议首先得到了王振海的支持。在表决通过后，王振海立即通知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郝占元、李正亭和全总党组负责人王志杰在六七年元月一日晚到达全总大楼会议厅共同签署《三家联合通告》。

《三家联合通告》签发后，立即送《工人日报》印刷厂套红大字铅印，同时由邵一海向中央文革报告和由郝占元向国务院报告。元月三日，邵一海告诉我们，中央文革认为这个文件很好，可以发往全国。但印刷厂因印刷量太大（三十万份），要等到五日才能印好。

五日未到，一天之间，事情就出现惊人变化——元月四日一大早，邵一海气喘吁吁跑来找我，说中央文革决定缓发《三家联合通告》。我问他是何原因？他也回答不出来，只是说“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叫缓发就缓发，你必须执行。”说完就匆匆走了。当天上午十点正，我接到江青的电话，她也是要我们缓发《三家联合通告》。我向她请示“缓发”原因，她只说了几个字：“现在发太被动”就放下电话。十一点，李晋晔接到戚本禹的电话，内容同样是缓发《三家联合通告》。

当元月五日《三家联合通告》印好，邵一海找到我和杨政，告诉我们中央文革决定要销毁《三家联合通告》，原因是“有人借此向毛主席施加压力”，“中央文革不愿在此时把事情搞得下不了台”，所以，干脆销毁算了。等一段时间，再争取中央常委通过江青的“三条”。

这时，李伯特由贵州来京。我把三份印好的《联合通告》交给他。告诉他中央文革已下令销毁。我说，这是好不容易取得一点可给工人带来实惠的成果，眼看就要毁之一旦。我把毛周不和，江青出尔反尔的情况一一告诉他，希望他能珍藏这一历史的见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设法在边远地区印发，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共让步，同时也使处境悲惨的临时合同工得到一点好处，坚固争取自身权益的信心。李伯特表示，为了中国工人的利益，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他将设法在西南地区重新印发。为此李伯特在北京仅仅停留一天，就匆匆南下。不几日，他已在云南昆明将《三家联合通告》大量翻印，发往全国。结果如同王年一先生所说那样——“不少工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待遇……掐着领导脖子强令发款。一些单位，……把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甚至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资，夜班费，加班费等”。“倾刻之间，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经济主义歪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五七页）

五、“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和周恩来遇刺事

“全红总”的独立独行，不仅表现在不受中共高层操控。力图冲破中共的高压和封锁，打开国际通道，也体现了“全红总”的独立意志。闭关锁国，剥夺人民的知情权，是中共建政十七年，特别是在文革初期的特征。对外交往在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的“大逆不道”的“里通外国”行为。但“全红总”首开了中共建政十七年的民间对外交往的独一无二的先例，那就是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在西苑饭店召开的“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又称“国际记者招待会”）。

“全红总”五人小组的金展云，前面已经提过，他并不是临时合同工，而是中央广播电台对外部波兰语高级翻译。他进入“全红总”的领导核心后分管对外联络亦即外交工作。在当时的群众组织中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当时的群众组织多在炮轰某一地区、某一系统、某一单位的“走资派”，批“资反路线”。但与众不同的是“全红总”早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改组后就把打开国际通道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我和王振海商量提名金展云进入领导核心的时候，有一个想法——中国的自由工人运动和独立工人组织需要国际上的声援、支持。金展云分管外联工作后，的确非常出色。他通过李敦白的关系，向许多外国左派驻京代表，外国专家，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们介绍了“全红总”。

《三家联合通告》签署后的次日——一九六七年元月三日，金展云在“五人小组”碰头会上告诉大家，为了让国际上了解“全红总”，应该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五人小组”一致同意了金展云的提议，并责成他和李敦白去筹备这一个会议。金展云和李敦白的办事效率很高，才一两天时间就筹备就绪，并把通知发给被邀请与会的外国朋友们，决定元月八日召开此会。关于会议名称，原订为“国际记者招待会”，但考虑到这个名称太敏感，改为“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会期确定后，金展云在总部会议上作了简报，大家也准备了与会的资料。总部会议结束后，我把“全红总”的这一决定告诉了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邵一海听后很吃惊，他告诉我：“对外交往是需要中央批准的，你们要特别小心，最好少和外国人打交道。这些外国朋友中混有别有用心的人。”邵一海说他立即报告中央文革，要我们等待中央文革同意再开会。我对他说，请帖都发出去了，希望他催促中央文革早些批准。这是六七年元月四日的事。直到会议召开前的元月八日中午，邵一海都没有肯定和否定的回答。元月八日中午吃饭时，我告诉邵一海，中央文革到现在没有否定的指示，会议应该如期召开，我希望邵一海能出席这个会议。邵一海听后脸色相当难看，情不自禁地念着：“胆大妄为，胆大妄为……”放下半碗没吃完的饭起身就走，也不和大家打一个招呼。这是我看见邵一海第一次生这样大的气。邵一海走后，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王振海和我身上。不言而喻，大家想知道在邵一海生气和中央文革未作答复的情况下，这个会还开不开。王振海用肘拐了我一下，我在他明亮的眼睛中看到坚定的闪光，这时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对他，也是对大家眨了眨眼，“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家一下不约而同大声鼓起掌来。看来，近八十名“全红总”的总部委员虽来自五湖四海，出身、背景不尽相同，但大家都在心底里有一个当时不能说出来的信念——管他什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元月八日晚八时，“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在西苑饭店大会议厅召开。有一百多名各国外交官、驻京记者、左派组织、驻京代表、援华专家参加。“全红总”全体总部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李敦白担任司仪和英文翻译，由我主持。王振海代表“全红总”作了重要讲话，其他的总部委员也介绍了本地区的临时合同工的悲惨遭遇。“全红总”几位代表发言结束后，外国朋友纷纷提问，由我和王振海回答。会议进行到近十二点才结束。会议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这张合影照，在我被逮捕后成为中共诬指我“里通外国”的证据。其实官方除了中央文革联络员邵一海出席会议外，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记者近二十人到会摄影采访。而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都全程摄像录影。会议结束后，所有的中共官方记者都来请示邵一海，关于会议的新闻发不发？只见邵一海黑着脸说了四个字：“一律不发！”后就匆匆走出了会场登车而去。

邵一海之所以这样生气，一是我们“胆大妄为”，“擅自”召开国际记者招待会。二是会上我们用大量事实揭穿了中共自诩“没有失业人口”的谎言，让全世界第一次了解了铁幕后所谓“当家作主”的大陆工人的悲惨境遇。这对于面子胜过肚子的“假大空”中共党文化来说，是极大的“犯上作乱”。这才是真正的“反了”。中共高层也开始尝到了对运动失控的味道。这大概也是以后中共决心取缔“全红总”的一个重要原因。

会后，周恩来在一次与我通电话时批评我：“你们就是不听话，不听打招呼。在外国人面前哭哭啼啼象什么话！家丑不可外扬嘛！你们这样做置中央于何地！”

“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以后，中央文革较少和“全红总”直接电话联系了。邵一海虽然经常来，但多是默默地观察，很少发号施令了。他知道，他讲的话，我们不一定听。直到元月十六日晚“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时，邵一海都象幽灵一样在我们身边。奇怪的是，元月十六日晚周恩来即将出席“全红总”万人大会的前几分钟，也就是周恩来的座驾已离开了中海南，快要到达北京工人体育馆前的几分钟，邵一海突然失去了踪影。在邵一海失去踪影的同时，我听到

一个更惊人的消息——周恩来在快接近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路上遇刺。

“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这个万人大会，就是江青曾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开的那个“中型会议”的扩大。“全红总”在十二月二十七日进驻全国总工会后，如前面提到过的，有一伙首都三司的学生不请自来，毛遂自荐地协助我们筹备会议。这伙人的头头有两名，一名是“地质东方红”的史学忠，一名是“清华井冈山”的宗祥荣。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元月十五日上午，史学忠突然把我拉出我的办公室，说有重要事情向我汇报，神秘地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会见了已在其中等候我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赵秘书。赵秘书告诉我，周恩来明天将出席我们的大会，问我希望周恩来讲些什么？

我对赵秘书说，我们希望在周总理不为难的情况下，为广大的临时合同工说几句关心他们疾苦的话，使他们看到改革临时工制度的希望。赵秘书略为沉吟，告诉我，他立即用电话向周总理请示。说罢，他拨通了周的电话，把我们的想法向周报告。他说后，不知周在电话中给他说了什么，他把电话递给我。周在电话中颇为诚恳地对我说，我们的要求他可以办到，他一定会表示临时工合同工革命造反的大方向是对的，党中央是支持的。他说，他有一个要求，希望我们不折不扣地执行——就是大会要提两个主要口号：一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另一个“抓革命，促生产。”他最后说，要“全红总”通过这个大会做好来京临时工合同工的工作，要他们立即离京返乡，减轻中央的压力，便于整顿北京的社会秩序。他最后问我能不能办到？我回答他：能。他说他会和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道来，要我们对刘宁一客气一些。周和我通完话赵就离开了史学忠的办公室。

元月十六日晚七时许，我和赵秘书，邵一海、王振海、杨政等提前到达北京工人体育馆。体育馆外有数千解放军担任警卫。体育馆内早已拥满各地来京的工人，座位无法坐下，许多人站在和坐在通道上。大约七点半钟，赵秘书和中南海通了话，告诉我们，周恩来和刘宁一分乘两辆小车离开了中南海，将在八点差十分左右到达工人体育馆。八点差一刻左右，刘宁一的座车先到。赵秘书问刘宁一，周总理的座车是否在后面？刘说在后面，一两分钟就到。赵秘书带着和杨政，还有近百名公安便衣警卫队在入口处等候周的来临。

寒风中，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赵秘书焦急地一次又一次地看手表。时间已到八点，周的座车仍然未来。八点十分仍然不见周的座驾踪影。赵等不住了，焦急地去休息室打电话。不一会，赵自言自语地从休息室出来，他边走边看手表边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我问他究竟怎么啦？他说，中南海说总理已经来了，怎么这样久还未到？大概到了八时二十分，周仍未来，赵秘书已如热锅上的蚂蚁，满头大汗。这时，一位警卫人员从休息室走来，叫赵秘书和“全红总”的负责人接电话。赵进入休息室听电话，脸色大变。他放下电话，悄声对我说：“总理途中遇刺。几十个骑摩托车的人向周总理的车子开枪，幸好红旗牌的防弹装甲很厚，马力又大，总理已经安全脱险回到中南海。你必须绝对保密，只能对群众说总理有特别紧急的事要处理，不能参加大会了。你快去请刘宁一书记（刘当时也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来，我和他们马上回去。”

当时事有蹊跷之点是：一、江青一伙本是这次会议的提议者，会前一口应承要来，当天为什么不见了？二、邵一海作为中央文革联络员，当天为什么中途失踪？而他失踪的时间正巧和周遇刺的时间如此接近？三、从这一天后，邵一海就和我们失去了联络，中央文革也不愿接听我们的电话，难道其中没有原因吗？四、江青的座驾在长安街上也曾被“联动”的一群狂人骑自行车追逐碰撞，为什么周的遇刺如此相似！只不过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

以上这些疑点均在目前无法澄清。究竟是有人想挑拨周恩来和“全红总”的关

系并籍此嫁祸于“全红总”？抑或是周恩来玩了“全红总”一手为今后镇压“全红总”制造理由？还是周的政敌刺杀周选上那天的时辰，周之遇刺与大会无关纯属巧合？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以上的推测只有等中共的有关此一事件的档案揭秘曝光之日才知分晓了。

六、王振海被劫持和“一·二三”事件

六七年元月九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广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根据周恩来指示操纵一些群众拟就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本刊编注：此二文告为已经从上海市委手里夺权的上海造反派组织所发，见本期文献资料。）第一次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元月十一日，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正如文革史家刘国凯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然而形势突变了，毛的中央从惊愕中醒悟过来，立即决定采取断然行动遏止这汹涌的浪潮。毫无疑问，群众的这一自发行动与毛的一贯思想和现实意图都大相径庭，毛的一贯思想是高积累、低消费、多援外，岂容群众的行动干扰背离这一目标！一股强大的飓风骤然拔地而起，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向人民群众的欢欣和希望。毛，这个自诩为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最推崇群众运动的人，曾讥笑别人“叶公好龙”的人，此时却对真正的群众运动十分嫌恶，并刻不容缓地进行了压制……为了使压制来得冠冕堂皇，他除了把广大群众的合理要求诬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外，还无中生有地硬说这场发自群众内心的运动是走资派阴谋挑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文化革命简析》一百三十一页）

元月十七日，即我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的次日，江青在接见首都红卫兵一、二、三司和解放军文艺团体和国务院各部造反派的会议上，和周恩来发出了动员令。动员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一百万（周恩来言）外地来京工人骗回去，压回去，打回去。江青指出，“到中央来干什么？把矛盾上交，你们说对不对呀？（众：不对）而且，住在这里不走，消耗国家很多的财力，物力，要什么都得给什么。”“…我觉得简直是养老的了，这个要好好给他说服，不行就给他施加一定的压力…”（《红卫兵》首都一司主办，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第十九号）

在江青发表这个讲话后几小时，首都三司驻“全红总”联络的史学忠、宗祥荣找到王振海和我，直接了当地告诉我们：中央希望“全红总”做“抓革命促生产，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模范”，自动撤销组织，通告全国，被王振海和我拒绝。我们告诉这些“小将”，要撤你们带头撤。这个“模范”你们去当吧。当时宗祥荣气急败坏跳起来吼道：“难道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要知道革命小将的脾气不是很好！”我当时笑着对他说：“脾气不好应该多做自我批评，你们想和工人阶级主力军较量较量吗？”

史学忠和宗祥荣软硬兼施地游说碰壁后，中央文革打来电话，要求迅速自动撤销组织，不要让中央文革太被动。

元月十八日，李晋喧在总部会议上提出，现在形势恶劣，有人扬言要来砸“全红总”，我们应该早作准备，以防不测。如何作准备呢？李晋喧说，应把总部的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保管起来。她自告奋勇地说，她家住中央广播局宿舍，是中央下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和冲击的禁区，有解放军把守，她愿保管总部的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当时，大家都认为她的提议很好，一致通过把公章印信和文书档案移交她家。

元月十九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周恩来不允许有全国性组织。他说，地方组织可以夺地方上的权，你们全国性的组织是不是要夺中央的权？中央拟在最近就要下达撤销全国性组织的文件，希望你们自己主动撤销，带头遵守中央的指示。接到这个电话，我在总部会议上向大家传达，并提请大家讨论是否主动撤销组织。讨论的结果，没有一个人奴从中共的高压和接受中共的欺骗拢络。

元月二十日，北京主要街道出现“砸碎反动组织‘全红总’！”的大型标语。当天下午王振海来找我陪他去国家科委。当时国家科委已被“造反派”夺权。夺权后的当权派——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张本要找王振海“谈一些重要问题。”

我和王振海是傍晚时分会见张本的。一见面，她就说她是奉周恩来的指示找王振海谈谈的。她开门见山地说：“周总理要我转告你们，‘全红总’应该主动撤销。因为你们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了。你们迎来了工矿企业文化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目前正在被走资派利用，走资派正在全国范围内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她说到这里停下，双眼瞪着我们说：“你们知道毛主席现阶段战略任务是夺权。中央原来叫你们进驻全总，就是叫你们去夺全总的权。但你们进驻全总后集中精力去搞什么‘三家联合通告’，完全没有领悟中央指示的精神。现在夺也不行了。一下子冒出这样多全国性组织，你们夺了全总的权，别的组织夺什么权？夺中央的权？夺国务院的权？想杀头吗？”她说到这里，双目透出凶光。她接着说：“所以，中央决定取缔一切全国性组织。至于你们，你们有功劳。江青首长支持过你们，你们的确有一定的号召力，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理要我告诉你们，最好有个善始善终。我想，你们是考虑组织撤销后自己怎么办吧？我不用担心。振海可以回到情报所。如果你认为情报所格局太小，我可以把你提到科委来，作为我的副手，你认为怎么样？她说到这里，双目紧盯着王振海，等待着王振海的反应。

王振海听后问张本：“我可以到科委，那么周牧他们怎么办？总部一大摊人怎么办？怎么对群众交待？”张本翻一翻眼白，慢声慢气地说：“有什么不好办：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嘛。回到本地区，本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嘛。去夺本地区、本单位的权嘛。群众，要靠你们去做工作，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工作做好了，中央不会亏待你们的。”张本说到这里，停下来转过话头问我：“周牧的家乡是哪里？原来做什么工作？”我告诉她，我的家乡是贵阳，文革前是一名合同工教师。张本听后说：“振海如果愿意来帮助我，做科委班子的副手，也可以带一些人来协助你开展工作。如果周牧愿意，也可以来嘛，科委可以搞一些理论研究嘛。你的意见怎样？”我听后感到一阵恶心。我和王振海相视一眼，彼此的心情尽在不言之中。张本看我和王振海均未表态，又加重语气说：“过来吧。不要担心待遇问题。我是行政九级，振海作我的副手不会低到什么地方去。”

张本误解了我们造反的动机。她赤裸裸的引诱伤害了我和王振海的自尊。王振海客气地更是坚定地对这个行政九级官僚说：“对不起，张本同志。我们感谢你的关心和好意。请你转告周总理，我们革命造反的目的是改革一切雇佣劳动制度，改革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不是想当官。我对权力没有太大的兴趣。如果感兴趣，我们早就夺全总的权了。周总理的指示我们会给大家传达。你的好意和器重我们长记在心。对不起，我们要告辞了。”说完，王振海和我抱起大义凛然离张本而去。

因为我们不吃“敬酒”，“罚酒”果然来了。元月二十一日，大约有二三百名首都三司的红卫兵来砸“全红总”，因为看见近千名的“前进战斗队”（“全红总”总部卫队，系参加原首都民兵师的地下铁道工人组成）全副武装守卫在全总大楼周围，喊几句口号后跑掉了。当天晚上，总部会议决定，为了显示“全红总”改革

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决心和争取临时合同工的权益，同时也为了反击当时指向“全红总”的凶涛恶浪，在元月二十二日中午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和示威。

元月二十二日，“全红总”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一面巨大的“全红总”大旗飘扬在金水桥前。当天的交通警察和广场守卫部队相当配合，不仅为我们维护交通秩序——截断了长安街的交通，而且把天安门广场的广播系统借给我们使用。当天我们的主要口号有：“要革命，要造反。要吃饭，要生产。”“誓死砸碎一切剥削制度！”“‘全红总’是革命群众组织！”“青松不老，红总不倒！”

集会后，近三十万人的队伍从天安门广场游行到复兴门外大街的全国总工会大楼。在全国总工会前，高昂悲壮的“国际歌”声响彻云霄。当晚近十二时，郝维奇惊慌慌跑来找我和王振海。当时我正和王振海商量一个大计——准备在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进驻全国总工会后的一个月，“全红总”撤出全总大楼，搬到广州、上海或长沙，把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斗争坚持下去。郝维奇送来一份打印的传单。这份传单以“首都三司”的名义印发，内容是陈伯达的“六点指示”。这“六点”的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1）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没有接见任何临时合同工代表。所谓江青支持“全红总”的讲话是伪造的，中央文革正式辟谣。（2）临时合同工制度中的不合理部份，留待运动后期改革。（3）“全红总”是非法组织。（4）“三家联合通告”是非法文件，应予以取消。（5）所有来京的外地工人，必须迅速回到本地区本部门参加那里的夺权斗争。（6）各地的“全红总”分团必须立即解散。

我们看到这份“六点”都非常气愤。我立即打电话给陈伯达，问他是否作过这“六点指示”？在电话中他一口否认，并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有人在挑拨中央和广大临时合同工的关系。要我和王振海立即带着这份传单到中央文革。当时已是元月二十三日凌晨。

我和王振海商量一下，决定通知李晋喧和我们一起去中央文革。因为李晋喧是分管和中央文革联络的“五人小组”成员，也是江青给我们推荐的。我马上和李晋喧通了电话。她当时已经入睡。她说她马上起床，要我们去她家接她。我和王振海为了防备不测，叫杨政通知了几个“前进队战斗队”的队员，分乘两辆小车——我和王振海、杨政三人坐前面一辆“别尔卡”黑色轿车，其他几名“前进队”的队员乘坐一辆“嘎斯”吉普。我们在前，他们在后驶向李晋喧家。

就在通往李晋喧家（广播局宿舍）的一条小街上，莫名其妙后面那辆吉普失去了踪影，一辆大客车横在前面路上。车上冲下来二三十名戴着白口罩、身着绿军装的人。我看情况不妙，立即叫司机掉头。但司机还未掉头，另一辆大客车已横拦在后面路上，同样冲出几十名白口罩、身着绿军装的彪形大汉。这一前一后几十人迅速包围了我们的小车，问：“王政海在吗？”王政海并未惊慌，沉着回答：“我就是王振海，你们要干什么？”那堆人中的头目说：“请和我们走一趟！”边说边强行拉开我们的汽车门，一拥而上，两三个人挟一人把我们强行挟到前面的大客车上，关上门就开走。这时，依靠路灯，看见其中有些人戴的袖套上有“国家科委革命造反兵团”字样。车子很快来到公安部门门口停下，几个人大概进去交涉了好一段时间才出来，看样子公安部不肯收留。车子又驶向北京市公安局。大约交涉了半小时左右，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公安人员随他们去交涉的人上了车，把王振海、杨政和我带进北京市公安局。在进入大厅后，那几个押着王振海、臂带红袖章的人把王振海押进一间房子，而这个公安人员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约有五十来岁，看样子是一位级别不低的官员。他客气地招呼杨政和我坐下，首先给我们道歉，说让我们受惊了。他说，国家科委系统的造反派已查明王振海是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将他揪送到公安局审查。公安局不予收留，因为这是他们本系统内的事。现在他们把王振海带走，去向不明。希望我们回去后不要告诉“全红总”的群众，以免造成群众斗

群众。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和杨政要负一切责任。他劝告我们快回家乡去“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再管北京的事了。否则，会有更大的麻烦，等等。说了近两小时，他把我们送出北京市公安局大门。此时，已是二十三日清晨七点钟。

我和杨政出了门，立即找了一个公共电话亭将夜间的事向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报告。他们都是一个腔调地告诉我们：中央将迅速去查明情况。在情况不明前，千万不要把王振海被劫持的事告诉群众，以免造成群众斗群众。我和杨政还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找到他们的负责人。他们的负责人和戚本禹通话后，说戚本禹听后很生气，中央文革将立即派专人清查，叫我们先回去休息。

等我和杨政回到“全红总”时，已近中午时分。只见全总大楼内内外外都贴满了大标语，内容是：“王振海反对党中央已被逮捕法办！”“坚决砸烂反动组织全红总！”这时，“全红总”北京分团数千名团员和总部卫队“前进战斗队”近千名值班队员挤满了全总一楼大厅，人人神情焦虑气愤。一看见我和杨政进了大门，不约而同呼叫起来。大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王振海呢？”

我告诉了大家王振海已被来历不明的坏人绑架。接着，我和杨政把昨晚我们被劫持经过简要地告诉大家。一时，人群激愤，不少人大喊：“去科委把王振海救回来！”我希望大家先冷静。现在王振海是否在科委还是大问题。我要大家先等一等，我去打个电话问问科委系统的“全红总”同志再说。

我上楼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后，看见除李晋喧、金展云而外的总部委员正在毛胜年、金云庆主持下开紧急会议。郝维奇正在隔壁的通间焦急地拨电话。大家一见我和杨政回来，轰的一下围上来问长问短。我和杨政把昨晚被劫持的情况又简要地给大家讲了一遍，请大家继续开会。我到隔壁找郝维奇，问他可否打听到王振海的下落。他说昨晚我们失踪后，总部已下紧急动员令。今天上午有王振海被捕的消息传来，但他不知道有科委造反派插手其中。我请他立即返回情报所，动员一切力量到科委找寻王振海。郝维奇急急忙忙走后，我打了一个电话问张本。张本在电话中一口否认科委造反派插手此事。她说昨天那些戴科委造反兵团臂章的人是冒充的，是有意混淆视线。我请她马上打电话去公安部说明报案。打完电话后，我参加了总部紧急会议。会议作了如下决议：

(一)以杨政、郝维奇为首成立王振海事件调查小组，负责营救王振海的工作。

(二)通知北京分团，每隔八小时派一个纵队来总部轮流值班，协助总部卫队保卫总部。
(三)一旦有人来砸总部，力争做到骂不回口，打不还手，做好说明解释的工作。

(四)责成李晋喧立即去中央文革向江青报告，希望中央文革向公安部查清王振海的去向。
(五)由我拟出《告全国人民书》，以备出现紧急状况时散发。

(六)通知金展云和李敦白联系，随时准备在全总会议厅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点左右，总部卫队从楼下打来电话，说有十车左右的打着首都三司、二司、一司等等旗号的红卫兵包围了全总大楼。我立即通知大家紧急集合应变。八点左右，连同前些时间来的那十车人，全国总工会大楼外大约集结了近万名打着各种旗号的红卫兵。他们手持棍棒，也有少数人拿着汽枪、猎枪、小口径步枪，在全总大楼周围组成一个大包围圈。因为大楼内有几千名北京分团的团员和一千名左右的全副武装的总部卫队，他们只敢呼口号，出言挑衅，还不敢冲进大楼。这时，听到总部被围，北京分团部分团员从各方赶来，把这近万名红卫兵反包围。

晚十点左右，外面响起轰轰的汽车声。我在窗边一看，只见几十辆卡车运着更多的红卫兵赶到全总大楼下，把反包围红卫兵的北京分团的群众再反包围。此时，我正式通知北京分团各纵队各派三分之一的群众火速增援。到了近十二点钟，各纵

队增援群众赶到，又把第三批红卫兵围个水泄不通。这时，外面人声沸腾，如一锅烧开的开水，我叫余洪珠广播了“不许主动出击，但也决不退让一步”的命令，并用广播带领“全红总”群众高唱“国际歌”，“我们工人有力量”，“工人阶级硬骨头”，“下定决心”等歌曲。到了深夜一点多钟，双方开始扔石头砖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多次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希望他们出面劝导学生撤走，否则，一旦发生严重后果，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到了三点左右，红卫兵开始用汽枪、猎枪、小口径步枪（也有可能用手枪）向全总大楼射击，“全红总”群众受伤人数已近百人。杨政、毛胜年和北京分团各纵队负责人一再要求我下令还击。但身为基督徒的我，从小对暴力极为反感，更不愿意看到流血，一直劝他们忍耐。我告诉他们，对方是一群上当受骗的狂热青年，人数又比我们少，他们嘴上叫得凶，实际上是弱者，我们何必和小孩子做一般见识。这时，毛胜年提出，如果有军方或其它武装力量介入怎么办？我告诉他，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愿与全总大楼共存亡。这样，大家一忍再忍，到了快天亮时，“全红总”的群众已无法忍下去，齐声大喊：“前进战斗队快开枪！”“前进战斗队快开枪！”

我看局势发展如此，再也难以控制。我向总理办公室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告诉他们如不在一小时内叫红卫兵撤走，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局面。打完电话，我一怒之下，连电话带电线一起扔了，和杨政等下楼去做最后的说服工作。说来也怪，我这一扔电话，不到半小时，几辆黑色小车从广播局方向开来，居然把这些疯狂的红卫兵叫走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得以制止。（未完待续）

□ 原载《北京之春》第46期（本刊有删节）

~~~~~

【文献资料】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斗争任务。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 ∞ ∞ ∞ ∞ ∞ ∞ ∞ ∞ ∞

###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永远忠于您的上海革命造反派全体战士，向您，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们正在最最热烈地欢呼您老人家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我们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时候，从北京又来了您老人家的声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这是您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的声音，这是您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鼓舞、最大鞭策的声音。我们欢呼，我们歌唱，千万句话说不尽我们的幸福心情，千万支歌唱不完我们的感谢心情，我们只有千万遍跳跃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总是在革命最关键的时刻，给我们指明斗争的大方向；您总是在斗争最尖锐的时刻，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精神力量。您永远热情地关怀和支持革命造反派。您永远培育和扶植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现在，您又在我们革命造反派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激战中间，批准了我们的大方向，肯定了我们的战斗任务，支持我们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您的这一伟大英明的决定，定将迅速点燃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什么反革命的经济主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者组织的新反扑，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都将统统在这场冲天烈火中烧焦、烧臭、烧成灰！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一再教导我们，敌人决不会自行消灭，决不会自动推出历史舞台。事实正是这样。上海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虽然他们玩弄的反革命的经济主义阴谋已经被揭穿，虽然他们已经在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开始全线崩溃，但他们仍然在进行疯狂挣扎。千方百计地企图瓦解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妄想在我们各革命造反团体中制造分裂，挑起纠纷，以便他们滑脚溜走，取得喘息时间，卷土重来。我们一定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一定要遵循您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致行动起来，穷追猛打落水狗，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打得永世不得翻身。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您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彻底肃清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的恶劣影响。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把革命造反派进一步联合起来，把革命的大多数团结起来，紧紧掌握住上海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使上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者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上海和外地在沪各革命造反团体欢庆中央贺电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 (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尚 琳 (英 国) <cm-ee@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张雨田 (美 国)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关蔚禾 (美 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 (美 国) <cnd-cord@cnd.org>  
《CND》代总编: 温 冰 (加拿大) <cnd-manager@cnd.org>

---

订阅 (或停订) 《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 (GB 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 (HZ 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 (F T P): ftp.cnd.org[149.159.2.6]: pub/hxwz  
或 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 (W W W): http://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